



日月光华·哲学讲堂

01

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

[法] 卡特琳娜·夏利尔 著 Catherine Chaliel

刘文瑾 编译

La Modernité et
les penseurs juifs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日月光华·哲学讲堂

01

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

[法] 卡特琳娜·夏利尔 著 刘文瑾 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 / (法)卡特琳娜·夏利尔
(Catherine Chaliel)著;刘文瑾编译.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7

(日月光华·哲学讲堂)

ISBN 978-7-208-14501-6

I. ①现…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犹太人-哲学
思想-研究-世界-17世纪-20世纪 IV. 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910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日月光华·哲学讲堂·

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

[法]卡特琳娜·夏利尔 著 刘文瑾 编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99,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01-6/B·1273

定价 32.00 元

“日月光华·哲学讲堂”

编 委

吴晓明 孙向晨 邓安庆

冯 平 李天纲 张庆熊

张双利 张志林 邹诗鹏

执行编辑

孙向晨 林 晖

总 序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思想之光，代代相传。在复旦哲学走过一个甲子之际，“日月光华·哲学书系”、“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应运而生。这既是过往思想探索道路上的熊熊火炬、坚实基础，以砥砺后学继续前行，亦是期许未来学术反思的灿然星辰，以哲学之力去勘探人类精神应有之高度与广度。为此我们当勤力不殆。

“兼容并蓄”是哲学成长的传统。复旦哲学建系伊始，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珪如、王遽常等诸位先生学识渊博，其来有自，奠定了复旦哲学的根基。他们不独立门户，不自我设限；不囿于教条，不作茧自缚；而是以思想和问题为导向，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由此造就了六十年来复旦哲学的特色。诸位奠基先贤始终秉持开放而专业的态度，强调严肃的学术训练，打破学科壁垒，追寻思想脉络，力图以真切而深邃的思考达致生活之本真，捕获时代之真精神。

“时代担当”是哲学不变的使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思想深入时代，对时代的根本问题做出积极的求索，是复旦哲学另一鲜明特色。真正的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理应紧紧抓住与时代血脉相连的命题，提炼精华，不断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优秀的学者须有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但这并不等于将自己封闭在无根的象牙塔中，而是真实切入时代命题的必备前提。切问而近思，人类的根本命题始终激荡于胸！

我们将以开放和虚心的态度来传承这些特色。“日月光华·哲学书系”不但收录了复旦哲院教师以往的代表作，也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吸纳复旦哲学人的最新力作。我们希望这一书系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括从复旦求学毕业、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及到复旦访问讲学的学界同仁的优秀著作，成为推动汉语哲学界不断发展前行的引擎。“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则希望将国内外学者在复旦所做的系列讲座整理成文，编撰成册，努力展现他们思想的源初轨迹，推进其理论贡献。以“日月光华”为平台，以学术为标尺，使国内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在共同的学术园地上得以生动呈现。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敞开的思想姿态、精准的学术眼光以及异乎寻常的努力与坚持。我们希望把复旦哲学“扎根学术、守护思想、引领时

代”的精神风格融入这两套丛书；我们期许它们不但能透彻地刻画出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还将在更为丰满的历史背景中探索思想的作用。唯有如此，我们的“书系”与“讲堂”才能超出一般丛书的范畴，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捕获者、诠释者、推动者和反思者。

思想薪传在任何时代都是无声、艰辛和困苦的事业，隐于“日月光华”这一个美好愿景背后的深意尤为紧要：思想的守护与传承是“旦复旦兮”的意涵所在，精神的催生与创新是生生不息的事业。“书系”与“讲堂”的出版并不是书目的简单累积，也不是论题的无序叠加，而是思想的流动和生长，是已有思想激发新思想的创造过程，是不断厘清思想限度、拓展思想疆域的漫漫求索，是幽微星火燃成日月光华的坦荡大道。在几辈学人的共同理想和不懈坚持下，既往的成果已然成为了沉甸甸的责任。由此，在决定“书系”与“讲堂”的名称时，我们选择将我们的理想标示出来，以此自勉，并期望人类趋向光明的理想，终将启迪人类的智慧，并照亮那条崎岖不平却让人甘之如饴的精神道路。

是为序。

孙向晨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复旦

现代性与犹太人的反思（译序）

20 世纪对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世纪。两个民族都经历了现代性进程中的社会历史浩劫，也产生了浩劫之后的民族复兴运动、历史反思和现代性批判。法国哲学家卡特琳娜·夏利尔（Catherine Chaliel）这本《现代性与犹太思想家》收集了她于 2013 年 4 月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所做的三个讲座，在此基础上，又由她自己增选另外三篇相关文章，与这一系列讲座一道，从几个不同面向，反映了现代性与犹太思想之间丰富的张力。

夏利尔女士是国际著名的列维纳斯研究专家，在巴黎第十大学任教。她继承列维纳斯的思想道路而进一步拓展了哲学与犹太思想的对话，在相关领域成就颇负盛名。列维纳斯的传记中记载过这么一件小事：采访者在列维纳斯面前提到夏利尔时，称她为列维纳斯的“学生”，而列维纳斯却纠正道：不，那是一位“朋友”。

“Shoa（犹太人大屠杀）”是西方现代史上上帝死亡的

时刻。犹太人的受难，犹如现代性的祭品。这也使得当代犹太哲人对现代性问题有特别深刻和沉痛的反思。这些反思对于中国这个正在经历现代性道路、同样承受了无数苦难、亟待痛定思痛的民族而言，无疑颇具启发。作为该书译者，笔者拟从现代性与犹太人的反思这一较为宏观的视角，叙述这本散点透视的论集背后的思想脉络，期冀有助于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1. 犹太人拒绝启蒙？

欧洲的现代性道路以犹太人的“献祭”为代价，我们因此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犹太民族是反现代、反启蒙的。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犹太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和启蒙有诸多批判，但批判启蒙不等同于反启蒙，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这大概是在面对现代性问题上，犹太民族同其他反现代、反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立场的最大差别。

苦难没有让犹太民族变得封闭和充满敌意。对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而言，过去的苦难不应当沦为恐惧与仇恨，而需要转化为一种对他人和未来的责任，这才是苦难能够

得到安慰或者救赎的方式。因此，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以对启蒙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为己任。这也是为何，施特劳斯这位著名的现代性批判者，在自己晚年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是犹太人》的演讲中说：“我觉得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久以来，我思考的主线就是犹太人问题。”^{〔1〕}

就近代历史而言，犹太人与其说是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不如说是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建构者。自18世纪，犹太教派很快接受了公民自由、宗教宽容以及个人主义等启蒙运动的观点，普遍蔑视“迷信”活动。犹太教甚至同基督教一样发生了分裂，产生了所谓改革派、正统派、保守派和重建派等。很多犹太人开始将传统的犹太社区及其机构视为蒙昧、过时和迷信的。

一方面，犹太教在改革中获得复兴；另一方面，犹太人中的精英一旦获得机会，就开始在欧洲事务的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他们当中既产生了摩西·门德尔松这位“德国苏格拉底”、启蒙思想家莱辛笔下《智者纳坦》的主人公原型，也产生了斯宾诺莎这位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充满争议的离经叛道者。门德尔松的孙子、著名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诗人海涅以及马克思，都是犹太人

〔1〕 施特劳斯：《犹太哲人与启蒙》，张缨等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

中著名的受洗者。更不用说犹太人中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教授、工商业家以及金融巨子等杰出人才对西方世界的贡献。以至尼采充满忧虑、不无反讽地惊呼：“欧洲在某一天可能像完全成熟的果子一样不经意地落到他们手上。……那时，他们将会被称为欧洲人的发明者和领路人，而不再冒犯欧洲人的羞耻感。……那么，安息日就会再次光临这里，古老的犹太人的上帝将能够与他自己、他的造物和他的选民一同欢欣鼓舞——而我们大家、我们所有人也都将与他一同欢欣鼓舞！”〔1〕

相较于历史上的基督教，犹太教对启蒙运动的接受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内部更少血腥暴力。在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中，较之于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等古老文明，犹太文明大概是最顺利的：一方面，他们在经济、科学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完成了同化；另一方面，传统的宗教信仰虽受到巨大冲击，却最终在危机中创生，保持活力。

为何犹太教能较成功地完成转型？这固然同犹太人摆脱隔离区的强烈渴望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犹太教传统本身便包含了启蒙的“元素”，这使得犹太教在遭遇

〔1〕 转引自施特劳斯：“我们为什么仍然是犹太人”，收于《犹太哲人与启蒙》，第408页。

启蒙运动时，能够合理地自我“扬弃”和创生。这种启蒙的“元素”，就是对自由和理性的热爱。这在很早以前，就体现为《塔木德》向读者开放的解经传统，以及犹太哲学家（如亚历山大的斐洛、迈蒙尼德等）将启示与理性结合的努力。

因此，在启蒙问题上，犹太教并未非此即彼。相反，对他们而言，启蒙与传统之间是一种彼此相顾的共生关系。他们在启示的传统中看到了启蒙的诉求，但又坚持启蒙仍需启示来引导。没有启蒙所体现的人的自由，启示的传统就是死的——活的传统必须是一种基于自由的联结与认同。而启蒙和自由若失去了需要持守的方向和意义，就只是人的自我为义甚至自我膨胀。这种激进的启蒙和自由是极其危险的，它最终呈现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面目，以及某种带有准宗教性质的革命暴力。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在对历史灾难的痛定思痛中，致力于清理那种否认启示的理性主义的专横，主张重启启示与理性之争。

犹太哲人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与洞见，深刻体现在夏利尔这本书中。她在专为中国读者而作的序言中指出：犹太思想史上有两个同现代性进行对话的关键阶段。第一个是在现代到来的前夕。她通过研究斯宾诺莎对迈蒙尼德公开和隐秘的抗议，来比较在此阶段已然存在的两种对启

蒙的理解。

迈蒙尼德是犹太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最早构建犹太教义的学者之一。他早在中世纪时就尝试让信仰与哲学对话，向学生传授如何通过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阿拉伯诠释，对妥拉（Torah）进行一种哲学解读。这在他的时代，仍是一种可能犯渎神罪的妄举。他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语言来撰写两类不同的著述。一类是以他心目中的宗教语言希伯来文写的有关犹太律法的解释，如《密西拿妥拉》。此书至今仍受正统派犹太教尊崇。另一类则是以当时的哲学语言阿拉伯文写的《迷途指津》。此书当他在世时就被列为禁书，时至今日，仍无法被正统派犹太教接受。

如果说，迈蒙尼德代表了犹太思想史上温和的，或者说，“经典”的启蒙态度，那么，斯宾诺莎，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非犹太哲学家，则代表了一种反传统的激进启蒙态度。他对迈蒙尼德将信仰和理性结合的尝试进行了强烈批评。迈蒙尼德迈出的启蒙步伐虽然勇敢，但还远不能满足他的期望。他想要迈出更彻底的一步，就是让信仰和理性完全分开：信仰是属于庸众的道德指南，更是统治者奴役人们的神权政治工具；拥有健全理性的人应当经由理性通达至善；好的政治生活应当摆脱宗教的影响，完全由国家政权来治理。斯宾诺莎的激进有其神权政治的时代背景，

他的主张深刻影响了西方世界的生活面貌。然而，他对迈蒙尼德的批判是否简化了迈蒙尼德在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审慎考量？在迈蒙尼德较之于斯宾诺莎的“保守”中，是否包含着一种斯宾诺莎未能发现的智慧？

这个跨时空的论辩至今无法终结。在施特劳斯和夏利尔这些关注犹太问题的哲学家这里，这是一个具有典范性的论争。两个半世纪后，尤其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之后，其中蕴含的诸多议题进一步发散出来，重现于以罗森茨威格和列维纳斯这两位犹太哲学家为代表的思想中，体现为对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同一性暴力的抵抗。这是犹太思想同现代性对话的第二个阶段。

本书中《罗森茨威格：在基督教世界里做个犹太人》一文，描绘了年轻的罗森茨威格皈依犹太教前的精神肖像。青年时代的他曾是黑格尔哲学的热爱者，而且，与许多同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曾打算皈依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才是对上帝的纯正信仰。然而，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痛苦的灵性挣扎之后，在赎罪日的一个犹太教堂中，他忽然发现了自己与犹太人民生命情感的强烈关联。他深感，当妥拉的词语被一群需要依靠它们来学习和生活的人言说时，就能传递一种既是肉身性、也是精神性的力量和希望。从此，罗森茨威格被犹太民族重新召回。他发觉自己只有

和这个民族一起，才能找到回归生活的道路，此外别无选择。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在大学执教的学者抱负。而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犹太教的研究与传扬。

这段重返犹太教的生命体验让他意识到了个体存在及其救赎的独特性，以及犹太民族的救赎道路不同于基督教的独特之处。而这些，在那个爆发了一战的时代，是独断的黑格尔哲学氛围所否定的。尽管罗森茨威格生前并未看到纳粹登台，但他已经预见了黑格尔式国家民族主义的危险，并在自己的杰作《救赎之星》中，以对人的“自我”的追问，来勇敢抗议这种专横的理性主义的统治。这个简短的精神传记实际上是对现代性前夕有关两种启蒙的典范性论争的一种现代回应，即：“我是谁？”的问题，究竟是应当交给雄辩的理性，还是留给人同上帝的问答与呼唤。

由这个真实的生命故事形塑的思想和书影响了一位杰出的读者——列维纳斯。他的思想既是对罗森茨威格的发展，也是对“书中之书”（《圣经》）的独特回应。本书中《声音与书》一文，在梳理了大量列维纳斯生前未刊稿和讲座稿之后，向我们揭示了《总体与无限》这部名著的两个关键词：“声音”和“书”。

“书”，特别是“书中之书”，不同于文献。它要求读者

投入自己的生命和问题，同过去的文本对话，唤醒隐藏于其中的精神。“书”的存在不能被化约为沉默的思想或理性，人们不可能孤独地阅读，而不回答来自过去和现在的“声音”。“声音”不同于名字，它有动词和象征意味，证明了一种我无法主题化的外在性，意味着他者的在场。列维纳斯试图寻找一条哲学道路，让光通常具有的视觉和沉默的特权——属于本质的特权——服从于声音的现象，让理性倾听他者。“书”的意义的繁殖性以及“书”对读者解读的要求，等待着一种有责任感主体精神，一种有“保”和“守”的大胆启蒙。只不过这种启蒙所要开启的，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对“书”和“他者”的倾听。

列维纳斯以对西方哲学所忽视和压制的“他者”的阐发，而在当代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他的哲学中，除了广为人知的“他者”之外，“声音”和“书”，是两个虽不那么受关注，却同样重要的词汇。它们不仅和“他者”一样，构成了对理性主义的抵抗，而且还是对“他者”内涵不可或缺的说明与限定。失去它们，失去那滋养了它们的塔木德解经传统，“他者”会沦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后”理论的新型解放武器：从指控“西方男性白人逻各斯中心主义”贬低“他者”的政治不正确，到借列维纳斯的“绝对他者”为跳板来高举自己“绝对的”政治正确，

其中不乏对列维纳斯思想“拿来主义”式地生吞活剥，之后还忘不了对其中所谓的“西方男性以色列霸权主义”踏上一只脚。坊间便出现了这类貌似富有“创意”和“批判精神”，其实却一知半解甚至错讹百出的列维纳斯导读中译本。

今天的“犹太人问题”，与其说是“古今之争”，是介于“启蒙与反启蒙”、“现代与反现代”、“西方还是东方”之间的两难选择，不如说是这样一些问题：选择“温和启蒙”还是“激进启蒙”？选择有所“保”与“守”的自由，还是主体自我立法的自由？只有辨明这个大方向，某些中国学者在拿犹太问题和中国问题对照时，才不致犯常识性错误，犹太人的思考也才会对在现代性进程中摸爬滚打的中国人真正产生意义。

2. 对于现代性，犹太人拒绝什么？

如果说犹太人接受了现代性在处理人性的政治形式方面的开放性，那么，他们所拒绝的是什么？从根本而言，犹太人的拒绝自古至今一以贯之，即拒绝人（首先是自我）与世界的罪性。在这方面，犹太教达到的人性高度，不仅